

# || 第一章 ||

## 緒論：古文的涵義 與韓愈所倡導的“古文”

古文泛指古代的文章或古代的文字，但韓愈所倡導的“古文”是一種文體，主張“師古”，但“師其意而不師其辭”，更要“惟陳言之務去”，即後代學者稱之為“唐宋古文”。王國維以為古文包括先秦的文字、非漢代寫本的先秦六國遺書和孔子壁中的藏書。今天我們所說的古文或文言文，通常與現代文或語體文相對稱和比較，則是從時代和語言學方面來觀察了。由此看來，古文一詞是有多種涵義的。

### 一、古文涵義的演變

唐代的“古文運動”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件大事。它糾正了被斥做“亡國之音”的六朝綺靡文風，<sup>1</sup>其中最重要的人物無疑是韓愈，故李漢說他有“摧陷廓清之功”，<sup>2</sup>蘇軾稱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。<sup>3</sup>但歷代文士和近代學者，鮮有闡述韓愈所倡導的“古文”的實質。<sup>4</sup>

“古文”一詞，常人多以之為古代的文章或古代的

文字。其實，它的含義，隨着不同的時代而改變的。東漢許慎《說文解字·敘》云：

及宣王大史籀，著大篆十五篇，與古文或異。至孔子書六經，左丘明述《春秋傳》，皆以古文，厥意可得而說。<sup>5</sup>

由此可知，大篆之前有“古文”。又云：

秦燒滅經書，滌除舊典，大發吏卒，興戍役，官獄職務繁，初有隸書，以趣約易，而古文由此絕矣。<sup>6</sup>

據此，秦代用隸書，凡其以前的文字，可統稱為“古文”。但秦代以後，不是沒有古文的，例如漢代的司馬遷誦讀用古文寫的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、《系本》等書，而唐宋古文的名篇，指的是文體，但是襲用古文一詞，就比較容易和指文字的古文混淆了。

## 二、秦以前的古文

王國維寫了四篇論“古文”的論文。<sup>7</sup>首先，他指出，戰國時代，六國用古文，秦國用籀文，二者皆源于殷周的古文，因地域不同而有異名而已，後人以為先有古文而後有籀文是錯誤的。他說：

秦用籀文，六國用古文，……故古文、籀文者，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，其源皆

出於殷周古文，而秦居宗周故地，其文字猶有豐、鎬之遺，故籀文與自籀文出之篆文，其去殷周古文，反較東方文字為近。……漢人以六藝之書，皆用此種文字，又其文字為當時所已廢，故謂之古文，此語承用既久，六國之古文即殷周古文，而籀篆皆在其後，如許叔重〈說文序〉所云者，蓋循名而失其實矣。<sup>8</sup>

王氏的見解是很有理由的。許慎《說文解字·敘》說：

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。斯作《倉頡篇》，中車府令趙高作《爰歷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學篇》，皆取《史籀》大篆，或頗省改，所謂小篆者也。<sup>9</sup>

秦滅六國，實行嚴刑峻法，統一文字，焚毀《詩》、《書》，所焚六國之書，皆用古文，故許慎以為“秦燒滅經書，滌除舊典，……而古文由此絕矣。”據此可知，戰國時代六國所用的古文，到了秦朝，就不通行。概言之，戰國時代的“古文”，在秦國稱籀文，在六國稱古文，同時出現，皆源於殷周的古文，即秦統一全國之前的文字，也通稱為“古文”。

### 三、非漢代寫本的古文

王國維認為《史記》所說的“古文”，是指非漢代寫本的先秦六國遺書。原來秦統一天下，推行“書同

文”以後，篆、隸行而古文、籀文皆廢，但在漢代初年，用古文、籀文寫的書，沒有完全毀絕。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云：

太史公曰：學者多稱五帝，尚矣。然《尚書》獨載堯以來；而百家言黃帝，其文不雅馴，薦紳先生難言之。孔子所傳〈宰予問〉、〈五帝德〉及〈帝繫姓〉，儒者或不傳。余嘗西至空桐，北過涿鹿，東漸於海，南浮江淮矣，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、堯、舜之處，風教固殊焉，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。<sup>10</sup>

唐司馬貞《索隱》云：“古文，即《帝德》、《帝繫》二書也。”又《史記·三代世表》云：

太史公曰：五帝、三代之記，尚矣。……余讀諫記，黃帝以來皆有年數，稽其曆譜諫終始五德之傳，古文咸不同，乖異。<sup>11</sup>

可知司馬遷讀的曆譜諫和終始五德之傳，是古文寫本。又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云：

太史公曰：“孔子言‘太伯可謂至德矣！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’。余讀《春秋》古文，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。”<sup>12</sup>

司馬遷讀的《春秋》也是古文寫本。又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云：

太史公曰：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，譽者或過其實，毀者或損其真，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。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。<sup>13</sup>

司馬遷所見的孔子弟子籍也是用古文寫的。又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云：“遷生龍門，耕牧河山之陽，年十歲則誦古文。”<sup>14</sup>《索隱》云：“遷及事伏生，是學誦《古文尚書》，劉氏以為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系本》等書，是亦名古文也。”由此看來，司馬遷誦“古文”，是用古文寫的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系本》等書。

從以上的例子看來，可以證明司馬遷所說的“古文”，是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繫姓》、“終始五德之傳”和用古文寫的《春秋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系本》等書；它們都是非漢代人寫本的先秦六國遺書。

## 四、孔子壁中的古文

王國維以為東漢時期，班固《漢書》所說的“古文”，是專指孔子壁中之書。他說：

後漢之初，所謂古文者，專指孔子壁中書，蓋自前漢末亦然。《說文·敘》記亡新六書，一曰古文，孔子壁中書也；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異者也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錄經籍，冠以古文二字若古字者，惟《尚書古文經》

四十六卷（原注為五十七篇），《禮古經》五十六卷，《春秋古經》十二篇，《論語古》二十一篇，《孝經古孔氏》一篇，皆孔子壁中書也。<sup>15</sup>

按《說文解字·敘》云：“壁中書者，魯恭王壞孔子宅，而得《禮記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。”<sup>16</sup>此說與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錄相同，而孔子壁中的書，皆用古文，故《漢書》在諸經之上皆冠以“古”字，顯示孔子壁中書與當時的寫本不同，由是以“古文”專指孔子壁中書了。

以“古文”專指孔子壁中的書，是有特殊意義的，因為這些古文經書與漢代通行文字隸書所寫的經書不同，最顯明的例子，是孔子壁中的《古文尚書》與由漢時伏生所傳的《今文尚書》，很有差別，於是有治古文經者，有治今文經者，各有家法，皆成一派之學。王國維說得對：

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，得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，謂之科斗書，是亦疎矣。求之《史記》，但云孔氏有古文《尚書》，而安國以今文讀之，因以起其家。……起，興也；家，家法也。漢世《尚書》多用今文，自孔氏治古文經，讀之說之，傳以教人，其後遂有古文家，是古文家法自孔氏興起也。<sup>17</sup>

在漢代，“古文”又指專治孔子壁中書的古文學派了。

## 五、韓愈所倡導的“古文”

中國文學，自魏晉到初唐的幾百年間，完全朝着藝術的唯美主義道路上走，講求聲律與辭藻的華美，結果流於外表華美而內容空洞，為士人所詬病，由是掀起了中唐時期的古文運動。<sup>18</sup>

唐代的古文運動，非始於韓愈，卻集成於韓愈。<sup>19</sup>韓愈所倡導的“古文”是一種文體，“乃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，而返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”。<sup>20</sup>

宋代初年，姚鉉編纂《唐文粹》，分文體為二十三類：古賦、詩、頌、贊、表、奏、書（指上書）、疏、策、文、論、議、古文、碑、銘、記、箴、誠、銘（座右銘）、書（指書信）、序、傳錄、紀事。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特標“古文”一體，與詩、賦、頌、贊、表、奏等文體同列。這是其他文集所沒有的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《唐文粹》的“提要”說：“論唐文者，終以是書為總匯，不以一二小疵而掩其全美也。”<sup>21</sup>清代許邁孫《唐文粹·綴言》云：

宋初姚寶臣氏（姚鉉字），勒成此書，蓋上續蕭《選》，精審謹嚴，是為總集不祧之祖。<sup>22</sup>

可見《唐文粹》在總集這一個類型中的價值，而“古文”是唐代“文粹”之一，足見韓愈所倡導的“古文”，在宋代已經得到確定的地位。

韓愈所倡導的“古文”，到了宋代，得到很大的成就。歐陽修揚言：“韓氏之文之道，萬世所共尊，天下所共傳而有也。”<sup>23</sup>《新唐書·韓愈傳》云：“自愈沒，其言大行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。”<sup>24</sup>南宋呂祖謙編《古文關鍵》，選取韓愈、柳宗元、歐陽修、曾鞏、蘇洵、蘇軾、張耒等的文章六十餘篇，指出每篇的命意、布局，給予學“古文”的人一些看文作文的門徑。從此以後，“古文”確然成為文章的一體了。

## 六、現代所說的古文

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，“古文”明顯衰落。正如胡適所說：

時代變得太快了，新事物太多了，新的知識太複雜了，新的見想太廣博了，那種簡單的古文體，無論怎樣變化，終不能應付這個時代的要求。<sup>25</sup>

新文學運動，主要提出兩個中心理論：一是建立一種“活的文學”，一是建立一種“人的文學”；前者是文字工具的革新，後者是文學內容的革新。<sup>26</sup>

傳統的“古文”，文詞講求典雅，內容以述志明道為尚；着重有感而發，不作無病呻吟，所謂“文章合為時而著，歌詩合為事而作”。<sup>27</sup>但在新文學運動期間，傳統的文藝思想不免受到衝擊，人們貪新忘舊，加上西方文藝思想的傳入，文士寫作，祇求個人思想、情感的



表達而已，再沒有“化下刺上”的觀念了。胡適為了打倒“古文”，曾經揚言：

今日之文言，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；今日之白話，是一種活的語言。白話不但不鄙俗，而且甚優美適用。白話並非文言之退化，乃是文言之進化。白話可以產生第一流文學。……白話的文學為中國千年來僅有之文學；其非白話的文學，皆不足與於第一流文學之列。<sup>28</sup>

用文言寫的文章，統稱為“古文”，用語體寫的文章則稱為“白話”。文言跟語體有別，今天我們所說的“古文”，當是廣泛地指文言文了。

## 七、古文的五種涵義

概括上文所述，“古文”一詞，有五種涵義：

- (一) 漢時所存的先秦文字。
- (二) 非漢代寫本的先秦六國遺書。
- (三) 孔子壁中的藏書。
- (四) 韓愈所倡導的一種文體。
- (五) 有別於白話的文言文。

秦有天下，實行“書同文”，篆、隸行而古文廢，但漢代仍有一些用古文書寫的先秦六國遺書，根據《史記》所載，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繫姓》、“終始五德之

傳”等，都是屬於這一類的書籍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，得以古文寫的《禮記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和《孝經》，解說這些經書的人，自成一派，衍為一家之學。先秦時代的文字，有鐘鼎文、科斗文、籀文、大篆、蟲書等，都是古代的文字，通稱為古文。韓愈倡導古文運動，主張文以載道，不務采色，不誇聲韻，力矯六朝的綺靡文風，形成一種獨特的文體。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，白話代替文言，文言又被視為不合時宜的古文。

綜上所言，“古文”一詞，除依着不同時代的轉變而改變其涵義外，更可從寫本、學派、字體、文體、語言好多方面來闡說。

韓愈所倡導的“古文”是一種文體。他主張師古，但師其意不師其辭，更力主“惟陳言之務去”和“不蹈襲前人”，故他的“古文”，內容雖“古”（古聖賢之道），而文辭則“新”（自樹立，不因循）。<sup>29</sup>現代學者錢穆說：“韓愈古文，實融化後起純文學之情趣、風神，以納於散文之中，在中國文學園地，增植新苗，其後蔚成林藪，此即後來之所謂唐宋古文者也。”<sup>30</sup>這樣說來，唐宋古文，倡自韓愈，其流大衍，蔚然成為我國重要文體之一了。

## 附注

- 1 魏徵《隋書》（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，1973）卷76〈文學傳序〉云：“梁自大同之後，雅道淪缺，漸乖典則，爭馳新巧。簡文、湘東，其淫放，徐陵、庾信，分路揚鑣。其意淺而繁，其文匿而彩。詞尚輕險，情多哀思。格以延陵之聽，蓋亦亡國之音乎！”（頁1730）
- 2 李漢〈昌黎先生集序〉，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》（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本）。
- 3 〈潮州韓文公廟碑〉，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（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本），卷55。
- 4 韓愈在唐代提倡“古文”，招收後學，抗顏為師，結果“犯笑侮”、“召羣罵”（見柳宗元〈答韋中立論師道書〉，《柳河東集》〔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2〕，卷34，頁541）。到了宋代，姚鉉編纂《唐文粹》，特闢“古文”一體，選錄韓、柳“古文”，而歐陽修則宣稱“韓愈之文之道，為萬世所共尊，天下所共傳而有也”（歐陽修〈記舊本韓文後〉，《歐陽文忠公文集》〔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本〕，卷73，《外集》卷23）。從此，韓愈所倡導的“古文”得到肯定的地位，但仍然沒有人闡明他所說的“古文”是什麼。到了清代，曾國藩纔說古文是一種文體，而現代學者錢穆也肯定它是一種散文。（詳見本章第五、七節）
- 5 《說文解字》，卷15上。
- 6 同上。
- 7 王國維有〈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〉、〈史記所謂古文說〉、〈漢書所謂古文說〉及〈說文所謂古文說〉，見《觀堂集林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3），卷7，第2冊，頁305-317。他同意許慎所說的“古文”，指漢時所存的先秦文字，其餘則有自己的見解。
- 8 〈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〉，《觀堂集林》，卷7，第2冊，頁305-307。
- 9 同5。
- 10 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點校本，1972年），卷1，頁46。
- 11 同《史記》，卷13，頁487-488。

- 12 同《史記》，卷31，頁1475。
- 13 同《史記》，卷67，頁2226。
- 14 同《史記》，卷130，頁3293。
- 15 〈漢書所謂古文說〉，《觀堂集林》，卷7，第2冊，頁312。
- 16 同5。
- 17 同15，頁310。
- 18 唐代的古文運動，雖由中唐時代韓愈、柳宗元所倡導，但實非始於韓、柳二人。關於唐代古文運動產生的背景、經過、影響等問題，有關的專書、論文甚多，毋用在此贅述。這裏所注意的，是韓、柳提倡古文運動所說的“古文”，實質上是一種文體。
- 19 參看拙作〈韓愈的古文淵源〉，《中文通訊》，第34期（1977-1978），頁74-83。
- 20 曾國藩〈復許孝廉振禕書〉，《曾文正公全集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91），第1冊，頁43。
- 21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），卷186，頁1692。
- 22 《唐文粹》（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本），卷首〈綴言〉。
- 23 同4。
- 24 《新唐書》，卷101，頁5269。
- 25 《中國新文學大系·建設理論集》（上海：良友圖書公司，1935），〈導言〉，頁3。
- 26 同上，頁18。
- 27 參看拙作〈略論中國文學思想的特色〉，《中華書局成立八十周年紀念論文集》（香港、北京、新加坡：中華書局，1991），頁84-94。
- 28 同25。
- 29 韓愈的“古文”理論，詳見本書第三章。
- 30 錢穆〈雜論唐代古文運動〉，《新亞學報》，第3卷第1期（1957年8月），頁54-155。

## || 第二章 ||

### 韓愈古文淵源

韓愈是一代文宗，他提倡的古文運動，影響深遠。蘇軾稱他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濟天下之溺”，不是諛辭。他三歲而孤，自幼即知苦學。唐大曆、貞元年間（766-805），風氣趨變，文字多尚古學，獨孤及、梁肅最稱淵奧，韓愈“銳意鑽仰，欲自振於一代”，真是承時而篤學了。韓愈的古文，有源於家學，有挹自師友，然後集成於一身，而以繼承儒家道統者自居，大聲疾呼，提倡古文，產生曠世無倫的影響。

#### 一、承襲時賢

唐代的古文，集成於韓愈，但非始於韓愈，因為唐代初年，陳子昂以復古為號召，其書疏奏議，樸實近古；玄宗好經術，崇尚典雅之體，當時的燕國公張說、許國公蘇頌的文章，氣體雄渾，號稱“燕許大手筆”；到了開元、天寶年間（713-756），蕭穎士、李華二人，奮起崇尚古文，力排綺靡之體；隨後有元結、獨孤及、梁肅、賈至等繼起，同聲附和，俱以古文見稱於世，由是文風漸變。降及貞元、元和年間（785-820），古文運動已成為一股蓄勢待發的伏流，等候適

當的時機而洶湧澎湃。及韓愈振臂高呼，打出鮮明的旗幟，招收後學，古文運動正式開始。

韓愈學古文，可謂“轉益多師”，既源自家學，亦承自師友（詳見下文），最重要的是他“性好文學”、“篤志學文”和“銳意為文”。他的〈上兵部李侍郎書〉說：

（愈）性本好文學，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，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，沈潛乎訓義，反復乎句讀，礪磨乎事業，而奮發乎文章。<sup>1</sup>

又其〈答竇秀才書〉說：

愈少騫怯，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，又不通時事，而與世多齟齬，念終無以樹立，遂發憤篤專於文學。<sup>2</sup>

此外，《舊唐書·韓愈傳》說：

大曆、貞元之間，文字多尚古學，效揚雄、董仲舒之述作，而獨孤及、梁肅最稱淵奧，儒林推重。愈從其徒游，銳意鑽仰，欲自振於一代。<sup>3</sup>

韓愈與獨孤及和梁肅的門徒來往，顯然受到二人的影響，而“欲自振於一代”，唯有盡力於學文與為文了。

## 二、源於家學

韓愈提倡古文，多半由於家學。他的父親韓仲卿是一位飽學之士，嘗任武昌縣令，很有政績，官至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。<sup>4</sup>韓愈不幸，三歲而孤，沒有受過父親的教導，但他以孤子之身，養於伯兄韓會之家，自幼“自知讀書，日記數千百言”；七歲便能“言出成文”。“比長，盡能通六經百家學。”<sup>5</sup>

他的兄長韓會，“善清言，有文章，名最高”。<sup>6</sup>“與盧東美、張正則、崔造為友好，談經濟之略，嘗以王佐自許”，“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”。<sup>7</sup>韓會很不滿當時的綺靡浮誕文風，作〈文衡〉以抨擊之：

文之大者，統三才、理萬物；其次敘損益、助教化；其次陳善惡、備勸戒。……後之學者，日離於本，或浮或誕，或僻或放，甚者以靡以愈，以蕩以溺。其詞巧淫，其音輕促。噫！啟姦導邪，流風薄義斯為甚。<sup>8</sup>

昌黎在他的家裏長大、讀書，他的文學功用的主張——“敘損益、助教化”、“陳善惡、備勸戒”，直接影響韓愈的為文理論，故宋王經〈韓會傳贊〉云：

觀〈文衡〉之作，蓋知愈本六經，尊皇極，斥異端，節百家之美，而自為時法。立道雄剛，事君孤峭，甚矣其似會也。孟子學於子思，而道過之，聖人不失其傳者，子思也。會兄弟師授偉矣。<sup>9</sup>

韓愈師承兄長之學，而成就則遠勝之，好像“孟子學於子思，而道過之”。

其次，韓愈的叔父韓雲卿曾任監察御史，官至禮部侍郎，在當時很有文名。李白〈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〉云：

雲卿文章冠世，拜監察御史，朝庭呼為子房。<sup>10</sup>

又李翱〈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墓銘〉云：

初，禮部君（雲卿）好立節義，有大功於昭陵，其文章出於時。<sup>11</sup>

而韓愈〈科斗書後記〉亦云：

愈叔父當大曆（766-779）世，文辭獨行中朝，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，取信來世者，咸歸韓氏。……元和來，愈亟不獲讓，嗣為銘文，薦道功德。<sup>12</sup>

韓愈自幼失怙而有一位“文章冠世”的叔父，想必受其感染薰陶的。韓雲卿善寫碑銘文，<sup>13</sup>退之“亟不獲讓，嗣為銘文”，實有繼承韓家世業之意，而其文集，碑誌文章極多（凡七十五篇），足以證明深受其叔父所影響。



又韓愈〈考功員外盧君墓銘〉云：

愈之宗兄（韓會）故起居舍人君，以道德文學伏一世，其友四人，其一范陽盧君東美，少未出仕，皆在江淮間，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。……君時始任戴冠，通詩書，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，以相磨礱浸灌，……其後為太常博士，監察御史，河南府司錄，考功員外郎，年若干而終。……君歿，（夫人，李姓）訓子女得母道甚，後君二十年，年六十六而終。將合葬，其子暢命其孫立曰：“乃祖德烈靡不聞，然其詳而信者，宜莫若吾先人之友。先人之友無在者，起居文有季曰愈，能為古文，業其家，是必能道吾父事業，汝其往請銘焉。”<sup>14</sup>

盧暢（韓愈摯友盧東美之子）謂韓愈“能為古文，業其家”，可見時人認為昌黎的古文，與其家學有關。

### 三、挹自師友（一）

除了家學之外，韓愈的師友對他倡導古文很有影響。前引《舊唐書·韓愈傳》說明獨孤及、梁肅是韓愈的先驅，這裏再細說他們實際上對韓愈的影響。

獨孤及（生平見《新唐書》卷162〈獨孤及傳〉），字至之，河南洛陽人。天寶末，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。代宗時，嘗任左拾遺，累官至禮部員外郎。喜鑿拔後

進，如梁肅、高參、陳京、崔元翰等，皆師事之。梁肅〈獨孤公行狀〉云：

（其）茂學博文，不讀非聖之書，非法之言不出諸口，非設教垂訓之事不行於文字；而遣言發辭，若山嶽之峻極，江海之波瀾，故天下謂之文伯。<sup>15</sup>

又梁肅為《毘陵集》（獨孤及的文集）作後序云：

天寶中，作者數人，頗節之以禮，洎公為之，於是操道德為根本，總禮樂為冠帶。以《易》之精義，《詩》之雅訓，《春秋》之褒貶，屬之於辭。故其文寬而簡，直而婉，辯而不華，博厚而高明；論人無虛美，比事為實錄。天下凜然，復覩兩漢之遺風。<sup>16</sup>

又唐崔祐甫〈獨孤公神道碑銘〉云：

常州之文，以立憲誠世，褒賢遏惡為用。<sup>17</sup>

又唐李舟〈唐常州刺史獨孤公文集序〉云：

天后時，廣漢陳子昂獨泝隕波，以趣清源。自茲作者，稍稍而出。先大夫常因講文，謂小子曰：“吾友蘭陵蕭茂挺（穎士）、趙郡李遐叔（華），長樂賈幼幾（至），洎所知河南獨孤至之（及），皆憲章六藝，能探古人述作之旨。”<sup>18</sup>

觀此可知獨孤及的文章風格。韓愈自謂“未知人事，讀聖人之書”（〈答崔立之書〉）、“非聖人之志不敢存”（〈答李翊書〉），與獨孤及的“不讀非聖之書”如出一轍；而他的宗經載道思想，正與獨孤及的“憲章六藝”、“非法之言不出諸口，非設教垂訓之事不行於文字”相同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《毘陵集》的“提要”以為，在唐代古文運動中，獨孤及是先行者之一，比韓愈更早推動古文：

考唐自貞觀（627-629）以後，文士皆沿六朝之體，經開元、天寶，詩格大變，而文格猶襲舊規。元結與及（獨孤及）始奮起湔除。蕭穎士、李華左右之，其後韓、柳繼起，唐之古文遂蔚然極盛。斲雕為樸，數子實居首功。《唐實錄》稱韓愈學獨孤及之文，當必有據。特風氣初開，明而未融耳。<sup>19</sup>

現代學者錢基博更力言：“其為文章，則韓愈之所師。”韓愈學獨孤及寫作文章。<sup>20</sup>

## 四、挹自師友（二）

梁肅（生平見《新唐書》卷202〈文藝·附蘇源明傳〉）與韓愈的關係，更為密切。韓愈初到京師，嘗遊學於梁肅之門；德宗貞元八年（792）登進士第，更是由梁肅所選拔的。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》云：

先是四君子（韓愈、李觀、李絳、崔羣）定交久矣，共遊梁補闕之門，居三歲，肅未之面，而四賢造肅多矣，靡不偕行。肅異之，一日延接觀等，俱以文學為肅所稱，復獎以交遊之道。……觀、愈等既去，復止絳、羣曰：“公等文行相契，他日皆振大名。然二君子位極人臣，勉旃！勉旃！”後二賢果如所卜。<sup>21</sup>

而韓愈〈與祠部陸員外書〉亦云：

往者陸相公（陸贄）司貢士，考文章甚詳，愈時亦幸在得中，而未知陸之得人也。其後一二年，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；原其所以，亦由梁補闕肅、王郎中礎佐之。梁舉八人，無有失者，其餘則王（案：指王郎中礎）皆與謀焉，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。<sup>22</sup>

梁肅的文章，深得獨孤及之傳，<sup>23</sup>“粹美深遠，無人能到，此事可以俟於知音，不可與薄俗者同世而論也”。<sup>24</sup>他的作品內容，大都是以“宗道德、美功成”、“絮當世、激清風”、“備教化、彰諷詠”、“惡戎醜、思康濟”、“明大道、宗有德”為主。<sup>25</sup>韓愈主張文以載道，而道則以仁義為依歸，想必源自梁肅之學。清趙懷玉〈獨孤憲公毘陵集序〉云：

退之起衰，卓越八代，泰山北斗，學者仰之，不知昌黎固出安定（梁肅）之門，安定實受洛陽（獨孤及）之業。公則懸然天得，蔚為

文宗。大江千里，始濫觴於巴岷，黃河九曲，肇發源於星宿。<sup>26</sup>

昌黎出自梁肅之門，而梁肅則受業於獨孤及。師承之迹，灼然可見。五代孫光憲謂退之宗仰梁肅，<sup>27</sup>而晁公武也說昌黎學獨孤及文章。<sup>28</sup>可知二人對韓愈寫作古文的影響。

此外，與韓愈有關的，是李華父子與蕭穎士父子。

李華（生平見《舊唐書》卷190下〈文苑下〉及《新唐書》卷203〈文藝下〉）是唐代古文運動先驅之一，時人說他開啟唐代文章之中興。<sup>29</sup>韓愈的伯兄會、叔父雲卿，都是他的弟子，而獨孤及亦出自李華之門。<sup>30</sup>從韓愈的家學與師承兩方面來說，李華無疑是他的古文開山祖師。

李華〈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〉云：

文章本乎作者，而哀樂繫乎時。本乎作者，六經之志也；繫乎時者，樂文、武而哀幽、厲也。……夫子之文章，偃、商傳焉，偃、商歿而孔伋、孟軻作，蓋六經之遺也。<sup>31</sup>

而獨孤及〈李公中集序〉云：

天寶中，公與蘭陵蕭茂挺、長樂買幼幾，勃焉復起，振中古之風，以宏文德。公之作，

本乎王道，大抵以五經為泉源，抒情性以託諷，然後有歌詠。美教化，獻箴諫，然後有賦頌。懸權衡，以辯天下，公是非，然後有論議。至若記敘、編錄、銘鼎、刻石之作，必採其行事，以正褒貶。非夫子之旨不書，故風雅之指歸，刑政之本根，忠孝之大倫，皆見於詞。<sup>32</sup>

李華的文章，“本乎王道”，“以五經為泉源”，以“美教化”、“公是非”、“正褒貶”為主旨，可說是韓愈倡導古文之所本。同時，他的從子李觀與韓愈為篤情好友，於貞元八年，同舉進士。<sup>33</sup>二人常常切磋學問，自然互有影響。李觀屬文，“不襲沿前人”，與韓愈的“惟陳言之務去”（〈答李翊書〉）相同，故時人謂觀“與韓愈不相上下”。<sup>34</sup>

## 五、挹自師友（三）

蕭穎士（生平見《舊唐書》卷190下〈文苑下〉及《新唐書》卷202〈文藝中〉）也是一位古文大家，與李華齊名，世人並稱為“蕭李”。《新唐書》本傳說他：“四歲屬文，十歲補太學生，觀書一覽即誦。……開元二十三年（735）舉進士對策第一，……天寶初，穎士補秘書正字。于時裴耀卿、席豫、張均、宋遙、韋述皆先進，器其材，與鈞禮，由是名播天下。”<sup>35</sup>李華〈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〉云：

開元天寶間詞人，……以文學著於時者，曰蘭陵蕭君穎士，字茂挺，……君七歲能誦數經，背碑覆局；十歲以文章知名，十五名譽滿天下，十九進士擢第，歷金壇尉、桂州參軍、秘書正字、河南參軍。……君謂：“六經之後，有屈原、宋玉，文甚雄壯而不能經。厥後有賈誼，文辭詳正，近於理體。枚乘、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，然而不近風雅。揚雄用意頗深，班彪識理，張衡宏曠，曹植豐贍，王粲超逸，嵇康標舉。此外皆金相玉質，所尚或殊，不能備舉。……近日陳拾遺文體最正。”以此而言，見君述作。……君有子一人曰存，為蘇州常熟縣主簿，雅有家風，知名於世。<sup>36</sup>

蕭穎士與李華友善。李華為韓會、韓雲卿師，而穎士子蕭存又與韓會、梁肅友善。韓愈少時即受蕭存知賞。<sup>37</sup>可知蕭氏父子與韓愈一家的密切關係了。

此外，與韓愈學習古文有關的，還有元德秀和元結。

原來蕭穎士嘗兄事元德秀。<sup>38</sup>而蕭穎士既是韓愈伯兄和叔父的老師，元德秀與昌黎亦可能有一些關連。元德秀無文章傳世，但李華說他所著的文章，“與古同轍，自為名家”，<sup>39</sup>必然也是一位古文家。《舊唐書》卷190下〈文苑下〉說他“所著〈季札聽樂論〉、〈蹇士賦〉為高人所稱”。

元結是他的族兄元德秀的弟子，<sup>40</sup>與獨孤及同是古文運動的先驅。宋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云：

結性耿介，有憂道憫世之思。……自謂與世聾啞，豈獨其行事而然？其文辭亦如之，然其辭義幽約，譬古鐘磬，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。<sup>41</sup>

宋高似孫《子略》云：

次山(元結)平生辭章，奇古峻絕，不蹈襲古今。<sup>42</sup>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《次山集》的“提要”云：

(元結)志行高潔而深抱閔時憂國之心，文章憂憂自異，變排偶綺靡之習。……蓋唐文在韓愈以前，毅然自為者自結始，亦可謂耿介拔俗之姿矣。<sup>43</sup>

雖然韓愈的家人和師友，與他拉不上關係，但二人耿介拔俗的性格是相同的；同時元結的文章，“奇古峻絕”，與韓文的風格相似；他的不蹈襲古今作風，又與昌黎所謂“辭必己出”、“惟陳言之務去”相吻合。故韓愈稱舉唐代文人，說他是“以其所能鳴”的一個人（〈送孟東野序〉），可見推崇之意。



## 六、博取集成

總括來說，唐代古文運動，不是由韓愈一人所開啟，也非由他一人之力而致成功。由上文所述，可知唐代初年，已有不少文士，反對輕靡纖巧的文風。到了開元天寶年間，蕭穎士、李華二人，力排駢綺，倡言古文，繼起的有元結、獨孤及、梁肅等人。大曆、貞元年間，形成一種崇尚古學的風氣；降及憲宗元和之世，古文運動已成一股蓄勢待發的伏流，等候適當的時機而澎湃。韓愈一方面秉承家學的薰陶，另一方面受到師友的影響，加上本身是一位天才作家和宣傳家，<sup>44</sup>既能以作品示人，又能以繼承儒家道統者自居，不畏訕笑，<sup>45</sup>大聲疾呼，倡導古文，吸引後學。同時在德宗貞元十八年（802），調授國子四門博士；憲宗元和元年（806）為國子博士，次年分教東都諸生；十五年詔為國子祭酒。這些官職，都處於領導天下文士的地位。因此，他的影響是深遠而容易播衍的。<sup>46</sup>

### 附注

- 1 馬其昶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2），卷2，頁83。
- 2 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2，頁80。
- 3 《舊唐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點校本，1975），卷160，頁4195。
- 4 《新唐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點校本，1975）卷176〈韓愈傳〉：“父仲卿，為武昌令，有美政，既去，縣人刻石頌德，終秘書郎。”（頁5255）又皇甫湜〈韓文公墓

- 銘〉云：“（愈）父秘書郎，贈尚書左僕射，諱仲卿。”  
（《皇甫持正文集》〔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本〕，卷6）
- 5 見《新唐書·韓愈傳》及皇甫湜〈韓文公墓銘〉。
  - 6 柳宗元〈先君石表陰先友記〉，《柳河東集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2），卷12，頁188。
  - 7 韓愈〈考功員外盧君墓誌〉注及原文，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6，頁204。
  - 8 王銍〈韓會傳〉，見魏仲舉輯《韓文類譜》（收入《粵雅堂叢書·二編》），卷8。
  - 9 同上。
  - 10 《李太白詩文》（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本），卷30。
  - 11 《李文公集》（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本），卷15。
  - 12 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2，頁54。
  - 13 《全唐文》卷441收錄韓雲卿碑文四篇：〈平淮碑〉、〈故中書令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〉、〈河南尹張公碑〉及〈虞帝廟碑〉。
  - 14 同7，頁205。
  - 15 見《毘陵集》（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本），卷20〈附錄〉。
  - 16 同上。
  - 17 同上。
  - 18 獨孤及生前任常州刺史，其文集《毘陵集》又稱為《獨孤常州集》，毘陵是常州的舊名。李舟〈唐常州刺史獨孤公文集序〉，見《毘陵集》卷首。
  - 19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），卷150，頁1285。
  - 20 錢基博《韓愈志》（香港：龍門書店，1969），頁24。
  - 21 《唐摭言》（《學津討原》本），卷7。
  - 22 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，卷3，頁117。
  - 23 同20，頁26。
  - 24 崔恭〈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〉，見《唐文粹》（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本），卷92。
  - 25 同上。
  - 26 見《毘陵集》，卷首。《四部叢刊初編》的《毘陵集》，是影印清趙氏亦有生齋刊本。趙即趙懷玉，清乾隆時常州人，他著有《亦有生齋集》。

- 27 孫光憲《北夢瑣言》（《叢書集成》本），卷6。
- 28 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（《國學基本叢書》本），卷17。
- 29 獨孤及《李公中集序》云：“天寶中，公與蘭陵蕭茂挺、長樂賈幼幾，勃焉復起，振中古之風，以宏文德。……二十年間，學者稍厭《折楊》、《皇華》，而窺《咸池》之音者什五六焉，識者謂之文章中興，公實啟之。”（見《毘陵集》，卷13）
- 30 《新唐書·李華傳》云：“李華，字遐叔，趙州贊皇人。……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，……華愛獎士類，名隨以重，若獨孤及、韓雲卿、韓會、李紆、柳識、崔祐甫、皇甫冉、謝良弼、朱巨川，後至執政顯宦。”（卷203《文藝下》，頁5775）
- 31 見《全唐文》，卷315。
- 32 同29。
- 33 同30，頁5776。
- 34 同上，頁5776。
- 35 《新唐書·蕭穎士傳》，卷202《文藝中》，頁5767-5768。
- 36 見《唐文粹》（《四部叢刊初編》本），卷93。
- 37 《新唐書·蕭穎士傳》云：“子存，字伯誠，亮直有父風。能文辭，與韓會、沈既濟、梁肅、徐岱等善。……韓愈少為存所知，自袁州還，過存廬山故居，而諸子前死，唯一女在，為經贍其家。”（卷202，頁5770）
- 38 同上，頁5768。
- 39 李華《元魯山墓碣銘序》云：“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九日，魯山今河南元公終於陸渾草堂，春秋五十九。服名節者無不痛心。……所著文章，根元極則《道演》；寄情性則《于蕩于思》；思善人則《禮》；多能而深則《廣吳公子觀樂》；曠達而妙則《現題》；窮於性命則《蹇士賦》。可謂與古同轍，自為名家者也。”（見《全唐文》，卷320）
- 40 見《新唐書》，卷143《元結傳》，頁4682。
- 41 《郡齋讀書志》（《國學基本叢書》本），卷17《校證》。
- 42 《子略》（《百川學海》本），卷4《元子》條。
- 43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卷149，頁1283。

- 44 參考鄭振鐸〈古文運動〉，《插圖本中國文學史》（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1961），第2冊，頁371-372。
- 45 柳宗元〈答韋中立論師道書〉云：“由魏晉氏以下，人益不事師，今之世不聞有師，有輒譁笑之，以為狂人，獨韓愈奮不顧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後學，作〈師說〉，因抗顏而為師。世界羣怪聚罵，指目牽引，而增與為言辭，愈以是得狂名。”（《柳河東集》〔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2〕，卷34，頁41）
- 46 關於韓愈的古文淵源，可參考錢基博〈（韓愈）古文淵源篇第一〉，《韓愈志》，頁1-28；羅聯添〈韓文淵源與傳承〉，《韓愈研究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77），頁203-220。

## || 作者簡介 ||

何沛雄，香港大學一級榮譽文學士、碩士、英國牛津大學文科哲學博士、台北中華學術院哲士、英國皇家學會院士、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、英國語文學院院士。歷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、台灣中山大學客座教授、韓國慶熙大學客座教授、香港新亞研究所客座教授。現任香港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、珠海書院中國文史研究所所長。編著有《古詩十九首》（英文）、《讀賦零拾》、《賦話六種》、《漢魏六朝賦家論略》、《永州八記導讀》、《新編中國文選》、《中國歷代賦選》（共四冊）、《隨身法寶—佛珠》、《四書嘉言》、《孔學五論》等書，撰寫論文、書評一百二十餘篇，遍佈中國、香港、台灣、歐美、日本及東南亞各地；又曾任《宋代書錄》（英文）、《世界和平百科全書》（英文）、《中國傳統文學備要》（英文）、《中華百科全書》、《海外漢學資料調查錄》、《中國文學名著鑒賞辭典》、《辭賦大辭典》等巨著之特約撰稿人。曾任中國國家重點出版計劃《新編全唐五代文》編纂委員、香港政府中文課本委員、香港考試局高級程度中文科目委員會主席、香港珠海書院《珠海學報》主編等職。